

论云南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

——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为中心

沈崢¹

(云南民族大学 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是用少数民族文字镌刻的文献材料,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是一种原始而又特殊的实物文献。通过碑刻文献对维护政权统一、抵御外侮、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等民族团结的记载,说明民族团结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为促进民族关系、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实物史料为今天民族团结工作开展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 民族团结 历史进程 时代蕴含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3-0030-07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事关国家统一、政权稳定 and 经济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云南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分布呈现出“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②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这样的分布情况必然促进民族间在生活、生产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古至今有着许多民族团结的史实。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文献中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大勐傣文九曜碑》《乍龙彝文摩崖》《民族团结誓词碑》,分别记录了古代、近代、当代等不同时期的民族团结事件,这些碑刻文献反映着云南民族团结的发展进程:古代以维护地方统治为主题;近代发展到抵御外侮、反封建统治的高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给民族团结工作赋予了各民族平等,拥护党的领导等新的含义,使民族团结更上一层楼。

一、以维护政权关系为主题的古代民族团结

云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地,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云南古代有着许多民族团结的史料记载。如云南省曲靖市建设路第一中学后花园内存有一通《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记载着大理国时期民族团结的史事。该碑记录了白蛮段氏政权与乌蛮三十七部在石城会盟的史实,是目前国内发现详实记述会盟事件的碑刻之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碑刻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碑高125厘米,宽58厘米,厚16厘米。碑文分上下两截,上截为正文,共11行,计140余字,为汉字记白语;下截为行书,是官衔题名,共8行。

碑文正文:“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奉承,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打贼郎羽口阿房田洞,合集州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乃共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③碑文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大理国明政年

¹作者简介:沈崢,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及其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14XTQ007)阶段成果。

间,其所属连弄、兔覆、磨乃、羽口、阿房、田洞等部落叛乱,于是大理国国主段素顺联合乌蛮三十七部打败了这些部落。取得胜利后,段素顺派遣皇叔段子珍、驸马布燮段彦贞到石城慰问乌蛮三十七部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同时任命三十七部首领职官、颁发赏赐,并举行歃血为盟的事件。方国瑜先生说“此碑不仅书法唐人遗意,且为大理史事之最关重要者,而史籍记载并无一字,尤为难得也”⁽¹⁾。

据《南诏野史·段思平传》记载,大理国建立时,段思平曾经联合三十七部打败大义宁国的杨干贞政权,段氏为感谢三十七部的帮助,提出“免东方三十七部蛮部徭役”⁽²⁾;并对三十七部加以封赏,封为大小领主,允许其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建立宗藩关系,实行羁縻统治,这些措施旨在加强民族间团结。《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碑文中“共约盟誓,务存久长”,表达民族之间团结友好,追求和睦的诉求。“双方用会盟的方式,表示团结一致,恪守盟约,刻石作为信物、证据。”⁽³⁾从大理国的建立到歃血会盟等历史事件的史料记载,印证了民族团结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政权统治及社会稳定的作用。

云南的民族团结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楚国大将庄蹻入滇后采取“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⁴⁾。虽然有不得已的缘由,但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民族团结;之后秦朝修五尺道、汉朝设益州郡等进一步加强云南与内地联系,汉武帝因俗而治、免其赋税的措施得到边疆民族的拥护,使云南地区安定和睦;三国时期,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征抚的策略、及其在对云南治理过程中尊重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积极发展生产,形成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唐宋时期云南地区先后出现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但都与中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较为开明,对建设中央政权与南诏政权的团结有积极的意义。虽然唐中期,双方友好关系一度遭到破坏,但唐后期的点苍山会盟,标志着天宝战争后唐王朝中央政权与南诏关系缓解,南诏统治者异牟寻“请全部落归附汉朝”⁽⁵⁾表明其民族团结的愿望。另外,南诏国内部也存在民族间团结,在南诏的政权中乌蛮为最高层统治者,而许多重要的官职则由白蛮出任,乌蛮与白蛮还通过联姻等方式加强民族团结;大理国时期,大理政权和宋王朝保持着友好往来,同时段氏政权与当地各民族间保持着较好的民族关系,大理国通过盟誓或册封的方式,对边疆民族区域实行羁縻政策,加强民族间团结与联盟;元朝时期赛典赤任用少数民族土官自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明朝大批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对云南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元明清三朝实行土司制度是重要的民族政策,既是因地制宜处理国家与各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具。从上述的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古代团结的特点在于加强各民族间的政治联系促进地方政权的稳固。

促成云南古代民族紧密联系、相互团结的原因有四点:第一,云南地处高原,山高谷深,山地只占总面积的90%,交通及其不便。这样的生存环境,更需要各民族的相互扶持,容易使人们之间形成共生互补关系。第二,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的种类多,难以形成某一民族的绝对权威;各少数民族在不断迁徙中逐步形成交错而居的生活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晋时期的汉族大姓与夷大帅结成“遑耶”(遑耶为彝语,意为结盟);南诏国的白蛮与乌蛮结成政治同盟;大理国的段氏与乌蛮三十七部的盟约等。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频繁交往,经济和文化逐渐融合。为了更好的生存,各民族间在交往中做到求同存异,团结和谐、共同进步是历史的必然。第三,云南少数民族基本上源于氐羌、百越、苗瑶及百濮四个族源,同源的民族在生活环境和文化认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联系,交流中容易产生共鸣。第四,先进汉文化的引入,促进云南与内地的民族团结。庄蹻入滇给云南带来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秦汉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扩大汉文化的影响;唐宋时期,地方少数民族高层人物积极学习并推广汉文化;元明清的大批移民使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儒学教育体系的进入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汉文化的向心力成为团结云南各族人民的纽带,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二、以抵御外辱、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为诉求的近代民族团结

近代以来,在各外来势力的入侵之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变化,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变为主要矛盾。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英法殖民者窥视的目标,边疆呈现出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使民族团结上升到爱国与振兴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呈现出抵御外侮及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的特点。

据张公瑾先生在《傣族文化研究》中记述,1976年在景洪市大勐笼公社大塔山南侧的水渠边发现了《大勐笼傣文九曜碑》,

这块碑既是研究傣族天文历法的资料,更是研究傣族地区民族团结、反抗外来侵略有重要史料来源。碑是大勐笼地区的群众共同集资兴建“城子佛寺”时刻立的,碑首刻有四幅傣族表述纪年的天文九曜位置图,当地人根据这些图推算立碑时间应该是傣历1162年。“碑的标题由三十六个圆圈和若干数字排成两行,是傣族地区传统的类似密码性质的暗语,译为‘祈祷二十八尊佛,战胜一切敌人’”^⑥。据张先生考证,立碑是为纪念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哈尼族、基诺族、汉族等联合战斗,打败缅甸木梳王朝侵略事件。

根据史料记载:18世纪后,英法殖民者扶植的缅甸木梳王朝曾五次对我国西双版纳等地发动侵略,使这一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也引起当地民族联合抗击。公元1763年,木梳王朝发动了第一次对西双版纳地区的勐遮、勐笼等地发动侵略。驻守当地的清军首领永顺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普洱知府达成阿等,组织当地土司起兵联合反抗侵略。在当地各少数民族团结抗击下,打败了侵略者并杀死木梳军头目卜布拉、召罕标;公元1765年木梳王朝发动第二次入侵,侵略军来势凶猛、大肆焚掠,迫使车里宣慰使从景洪逃走。在当地清军和各族人民顽强抵抗三年后,侵略者被赶出国土;公元1867年木梳王朝第三次发动侵略,侵略者在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一路焚烧虏掠,致使当地人民颠沛流离,经济惨遭破坏。史书记载:“至章凤街,始见人家野圃中油菜作花矣。缅人通贸易时,此地市集最盛,今人民窜徙,仅有竹房数架耳。”^⑦当地各族人们又一次联合起来,打击侵略者;公元1822年木梳王朝趁车里统治者内部夺权之争时发动第四次入侵,闯入傣族地区,致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1834年木梳王朝发动第五次入侵,木梳国王派兵攻打景洪,车里宣慰使刀正综逃往江东避难,木梳军侵占景兰、景德等地,并残杀当地老百姓。普洱地区军民联合抵抗,最终取得胜利,保卫了国土家园。木梳王朝的五次入侵,严重影响傣族地区的和平安宁,战争阻碍了这一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但是从反抗木梳王朝五次侵略的斗争中,反映出边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之举。《大勐笼傣文九曜碑》见证着当地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亲密团结反抗外来侵略事件,是民族团结重要的历史文物。不幸的是,该碑被发现时曾移至县景洪县文化馆保存,但在单位几经分合后,现已找不到此碑踪迹。

近代以来,随着云南周边国家已经先后沦为英法殖民地,云南便成为英法帝国主义殖民者欲蚕食的目标,他们不断在我国边境滋事挑衅,甚至多次入侵我国领土,这些恶劣行为引起云南各族人民的愤怒,边疆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保卫家园的事件层出不穷。如1875年,以汉族、回族、傣族、景颇族等各民族团结起来抗击英国入侵的马嘉理事件;1891-1898年,英军侵略干崖地区,干崖宣抚使刀盈廷、刀安仁父子率领傣、汉人民奋起反抗,刀安仁及部下在八关九隘之间与英军苦战达8年之久,最终将侵略者赶走;1897年陇川王子树率领景颇族、汉族、傣族民众100多人将英国测量队驱逐出境外;1891年—1911年片马地区的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汉族、彝族、怒族、独龙族等联合抗英,并得到腾越镇总兵和同知支援,“派兵往援,并饬不准越界追击,英兵始退出界外”^⑧;1933年,班洪地区佤族与景谷、双江、澜沧等地群众组成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联合,在班洪地区展开了抗英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滇西各族人民团结努力,克服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用9个月时间修筑了一条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这些都是边疆各民族用鲜血书写了团结御侮,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史诗。

近代民族团结还表现为各民族团结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上。清朝末年,统治者将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转嫁于人民,面对各种苛捐杂税人民生活不堪重负。云南经济远落后于内地,各民族的生活极其贫困,加上清政府采取有意制造和扩大民族不平等政策,逼迫一些地区的民族奋起抗争。

位于石林县圭山乡乍龙村石壁上的《乍龙彝文摩崖》,就是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实物见证。该碑面长90厘米、宽50厘米,没有刊刻时间,据考证,此摩崖镌刻于清咸丰年间、估计撰写者是清朝彝族农民起义军,起义失败后隐身深山时写下的。碑是用彝汉两种文字共同刻写的,共三部分,上、中部为汉文,下部为古彝文,碑刻有彝文525个字,用黑色原料书写于岩石上,现除少部分彝文已模糊不清外,大部分尚可辨认。碑文以近似于白话文语句记述了清朝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路南县撒尼人、弥勒县的阿细人及当地汉族集于麟马洞,举行盟誓后,向板桥镇发起攻击并取得胜利,后又向州城进发,引起官府恐慌,省府紧急派军加固城防,并打算扫荡彝区,但是被义军的痛歼,州城也被义军攻占,“路南、宜良、华宁一带是彝族钱发有、赵发、普天章、普顺才等领导的彝、汉、回等族农民起义军控制区域。”^⑨同时建立彝族农民政权,并得到杜文秀的封号。后来义军政权被清军围剿,义军伤亡惨重、首领牺牲、被迫退出州城。清末,云南各民族中像这样联合的起义不断,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局在云南的统治。

云南近代民族团结既延续了古代民族团结,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抵御外辱、保家卫国和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第一,近代以来云南周边的缅甸、越南和老挝等先后沦为英、法的殖民地,云南也因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英、法侵略中国的一个端口,英、法无理由的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了边疆人们的利益,促使边疆各族人民,冲破往日的民族隔阂,生死相助,守望相扶,紧密团结在一起反抗外来侵略;抗日战争中,云南成为大后方,肩负着为战争供给物资的重任,因此,再一次促使各民族的团结抗日。云南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推动。第二,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不断丧失主权的的同时,也加深人们的经济负担,生活极端贫困和清政府在云南所采取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促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因此,近代的反侵略和反清政府腐朽统治,使云南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一致,进而使民族关系更加友好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述云南民族团结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出,无论那个朝代的民族团结往往是为维护某一共同利益而结成的联盟,这种联盟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历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缺乏民族平等意识,大多采用“攻心”与“兵战”相结合的策略解决云南的民族问题。这种策略的实施尽管一方面能带来各民族友好相处,但是,另一方面则更多表现为民族关系紧张、社会不和谐。同时,由于各民族间存在着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造成民族压迫、剥削与歧视。从而使民族间的纷争不断,民族起义时有发生,如清末年间的杜文秀、李文学起义就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实现民族平等,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压迫,解决各民族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才能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三、以民族平等、拥护共产党为特征的当代民族团结

毛泽东主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¹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云南的民族团结工作可谓是深入细致,并且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坐落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城西北“民族团结园”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见证着这段历史。它不仅是云南民族团结的丰碑,更加折射出全国民族团结工作的巨大成就。

《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该碑高 142 厘米,宽 65 厘米,安置在碑亭中。碑上方刻有会盟誓言“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¹¹⁾碑的下方为 48 位立誓人的签名,这些签名有汉文、傣文、拉祜文三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既有境内民族团结,也有与境外分裂势力的博弈。因此,民族团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平衡,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严重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能致力于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建设,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友好善意的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普洱是拥有 14 个世居民族的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尤为重要。当时的民族工作者们遵循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发生矛盾和误解要‘先作自我检讨’”⁽¹²⁾的四条指示进行民族工作。为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加 1950 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他们深入基层耐心细致说服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组织 34 名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代表们到京后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受到毛主席 4 次接见。国庆观礼后,政府又组织他们参观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对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信心。这些代表们回到普洱后参加“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会议决定采取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方式来表达各民族“团结一心跟党走”的愿望。1951 年元旦,13 个民族的 48 位代表聚集到普洱红场,以歃血为盟和剽牛盟誓的民族传统习俗进行结约,并树立了《民族团结誓词碑》。誓词碑共有汉族、傣族、佤族、彝族、回族、白族、瑶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布朗族、基诺族、傈僳族等 13 种民族 48 位代表签名,可见民族团结的广度,它反映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所不能实现的。这座历史丰碑的树立,既是云南边疆又是全国民族团结的象征。碑的树立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传递到各民族中,为取得民族信任和支持提供依据。碑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为加强民族团结一心跟党走,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贡献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族平等,彻底结束了压迫、剥削、歧视少数民族的历史,将民族团结推向新的高度,更大程度上取得各民族的信任与支持。其原因在于:第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4 年宪法及以后修订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各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相当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赴京观礼国庆一周年活动的决定中,中央要求“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各民族上层只要不是人民公敌就要尽量争取。”⁽¹³⁾云南省在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对少数民族工作,坚持贯彻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灭历史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¹⁴⁾的方针。同时,省政府针对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慎重稳进地开展民族工作,对民族边疆地区实行较内地宽松一些的政策,促进各民族团结。第二,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民族平等,从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各族人民都是人民政权主人。这种民族平等表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识别工作等方面。云南是民族自治区域最多的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实现了各民族人民政治上平等的诉求,促进了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意识;任用少数民族不仅方便民族间的交流,而且从根本保证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是巩固各民族团结的最好措施;1954年开始的民族识别遵从“名从主人”原则,真正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第三,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实施,彻底消灭千百年来的剥削制度,各少数民族不再受压迫、受歧视,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如云南省对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独龙族、怒族等8个民族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使他们直接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跨越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族经济关系逐步实现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

通过对《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大勐笼傣文九曜碑》《乍龙彝文摩崖》及《民族团结誓词碑》四块丰碑的考察,记录了云南不同时期的民族团结事件及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历史渊源延续及升华的见证,反映出民族团结精神薪火相传。

四、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中民族团结的时代蕴含

习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¹⁵⁾。上述碑刻告诉我们,民族团结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它能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发掘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中的民族团结的时代蕴含,对于今天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拥护党的领导,实现民族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工作的基础是民族平等,云南少数民族的种类为全国之首,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为彝族,约有502.8万多人,人口最少的为独龙族,约有5500多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些民族的经济水平较高、文化较为先进,如白族、傣族等,而其中一些民族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其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面对各民族间人口、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情况,只有做到民族平等,才能实现民族和谐、社会稳定。从云南发展史看,历代统治者虽然重视民族问题,并采取羁縻、土司、改土归流等政策进行治理,并取得一定效果,但存在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等,不同的民族间没有真正实现平等。《乍龙彝文摩崖》记载了由于清政府实行不平等民族政策,而导致石林、弥勒地区各民族联合的反抗斗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将“各民族一律平等”写入宪法,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中,刻录下来自不同民族发出的肺腑之言:“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我国的民族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民族团结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1年5月6日,国务院批准并出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¹⁶⁾的意见,以支持云南的桥头堡建设。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云南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上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实施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定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特殊政策;实行“三免费”义务教育;在省直部门配备少数民族厅级领导干部;针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先后投入资金200多亿元进行“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重点建设示范区。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各族人民由衷地发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

(二)确保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

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省份,边境线长达 4061 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居住于边境的民族担负着守卫国土家园,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清朝统治末年,云南边疆各民族群众能在英法等入侵下,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篇章。《大勐侏文九曜碑》就是边疆各民族团结赶走侵略者的历史见证。

在云南省边境有 16 个民族跨境而居,这些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有着相似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使他们相互之间一直延续传统的联系,如通婚、交往等,甚至保存有统一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较有可能引发偏离我国的观念,进而引发不利于边疆稳定、和谐发展的事件。因此,做好跨境民族的团结工作,不仅有利于边疆稳定、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且也有利于睦邻安邦,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随着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针对跨境民族生活状况,云南省于 2005-2010 年累计投入资金 425 亿元,进行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建设;2011 年启动实施了《云南省兴边富民工程“十二五”规划》,通过 10 年的努力,边境地区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2015-2017 年推出“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逐步实现沿边地区群众“五通”“八有”“三达到”,通过精准扶贫工作,降低贫困率。使边境各族人民更加坚定地做好民族团结,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三)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少数民族委员时指出:“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¹⁷⁾可见,党和政府强调从广度和深度重视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工作。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广度表现在:首先,扩大宣传范围。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历来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但客观的说,宣传教育工作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更为重视,而在其他地区比较淡化。宣传教育工作应该在全社会内进行,实现全国各民族的“五个认同”,达到民族团结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其次,宣传教育方式通俗化。因为宣传对象的大众化,所以用一些简单明了内容比长篇大论更能被大众所接受,如讲故事、事迹汇报、简洁的标语等。第三,宣传教育途径多样化,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传统途径有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文物古迹(如碑刻等),同时运用当今时代新技术、新媒体传播速度更快,影响力极大的特点,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软件 APP 等进行宣传,使民族团结教育更上一层楼。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深度表现在:首先,采用滴灌式精准宣传教育。针对不同人群采用适当内容、方法和形式。如针对领导干部应该加强民族政策理论的学习、民族工作考察与交流;针对学生应该按照不同层次设计相应课程,将民族团结作为必修课程学习,让学生掌握民族团结的相关知识;针对跨境民族应该加强民族平等、团结和保卫国土家园及党的惠民政策等学习。其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主题活动在于集中宣传教育,能有效提高宣传教育的成果。如采用民族节日进行宣传教育、实地参观考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主题活动能结合本地区特点和实际,更贴近生活,印象更为深刻,从而达到学习的深度。实现团结宣传教育常态化、多样化、社会化,将其内容融入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中,把经常性教育和阶段性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对不同时期民族团结事件的记载,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利和共享是民族团结的基本要求,民族团结关系到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工作,把加强民族团结视为各民族发展的生命线确保边疆的稳定,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最终目标。

注释:

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63 页。

-
- 2 杨宗亮:《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 3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大理历代名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
 - 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7页。
 - 5(明)倪艳辑,木芹会证:《南诏野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 6 李昆声:《云南文古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77页。
 - 7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93页。
 - 8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页。
 - 9 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 10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2页。
 - 11 谢本书:《片马问题研究》,《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
 - 12 高光汉:《咸同年间云南各族农民起义的特点》,《思想战线》1989年第4期。
 -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 14 黄桂枢:《论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 15 龙成鹏:《用故事讲述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经验——读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之二》,《今日民族》2017年6期。
 - 16 郑茜:《民族团结誓词碑》,《中国民族》2009年10月。
 - 17 当代云南编辑部编写:《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 18 《汇聚民族团结的筑梦力量》,《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日第3版。
 - 19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云南日报》2013年2月5日第9版。
 - 20 《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6npc/GB/402742/index.html>,2013年3月4日。